

# 论抗战期间吴鼎昌对贵州的经营与影响

马国君<sup>1</sup>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作为陪都重庆的南部屏障及抗战大后方的贵州，如何开发其人力、物力，维持社会稳定，支援前线抗战诸事宜，成了当时主政者之急务。在此期间，吴鼎昌受国民政府派遣，出任贵州省主席等职。他通过实地考察，结合自己多年从政经验，迅速摸清了黔省政治、经济、社会等实情，并对此进行有效改革整顿，对稳定贵州，建设大后方，支持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吴鼎昌；人力开发；物力开发；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谏，民国政府新政学系骨干和金融界首脑，曾任北京民国政府国会议员、参与南北和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这样的任职经历和社会身份，加之做事干练<sup>[1]</sup>，成了抗战时期主政贵州的重要历史人物。贵州地处西南腹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元明清三朝，为稳定西南，黔省经济不断发展，清中后期以降，由于国内战乱、边事纷繁，省经济文化处于停滞或缓慢状态。抗战全面爆发后，如何发挥贵州屏藩陪都，支援抗战大局，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此时吴鼎昌受国民政府派遣，主政黔省，迅速稳定、建设贵州，支持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吴鼎昌治黔史，引起了学界重视，成果主要有《吴鼎昌与贵州社会》《吴鼎昌与抗战时期贵州的禁政》《吴鼎昌的实业主张与实践》等（1）。为重温这段历史，加深对抗战时期贵州的理解，本文拟从吴鼎昌入黔前的省内形势，吴鼎昌治黔及其影响诸方面加以说明。

## 一、吴鼎昌入黔前的省内形势

历史上，西南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地理环境复杂诸多因素，经济文化发展与内地差距甚大。就贵州言，尽管1935年以来，经国民政府派员治理近三年，然各方面进展不大，政治上，制度不健全，吏治腐败；经济上，除公路交通略有发展外，其余建设甚少；教育上，亦还停留在起步阶段。此情形，吴鼎昌将其归纳为“人力、物力开发不健全”。

### 1. 人力开发滞后，支撑大后方先决条件缺乏

吴鼎昌“人力开发”思想是人的全面发展，内容关涉人的数量和质量。他在《花溪闲笔》中言：“本人来贵州之前，常听说贵州是一个很不富裕的省份，所以不但本人认为目前贵州之切要，在开发资源，就是中央及地方，也都以此期望于贵州当局，以此作为贵州地方行政之方针。但到贵州后，先后到各地视察，加以同地方人士接谈结果，觉得贵州的物资固有待开发，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人力的发展至少，人力的开发，应与物力的开发同时并进，平衡发展，否则徒言开发物力，收效一定很小。原因是贵州人口太少，同时贵州的人力也较弱。”<sup>[15]</sup>

---

<sup>1</sup>**作者简介：**马国君（1977—），男，苗族，湖南麻阳人，博士，教授，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西部之光”南开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边疆民族史、边政史、西南环境史；

**收稿日期：**2017-08-20

**基金：**国家重大招标课题“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集、研究与利用”（16ZDA156）；

历史上，黔省人地关系，明代官员就说“黔不患无田，患无人”。后虽经三个多世纪的发展，贵州人口数量仍然很少，难以承担抗战大后方的重任。吴鼎昌言：“黔省面积据内政部调查及统计局计算，约 179477 方公里，人口约 10484900，按这个数字来计算，每方公里平均不过 60 人。拿这个数字来同其他省份比较，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本省人口少的现象。再就土地亩数来说，全省土地约 26000 多万亩，每人平均有 26 亩，这人数是包括男女老幼。数字之大，又是普通他省所少见。就可耕地来看，全省可耕地约 5300 多万亩，而全省壮丁不过 170 多万，是每人要耕种 31 亩之多，远超过一个人的负担力。假如有女壮丁一半帮忙，每人也须分担 20 亩，况 1040 万人中，至少有十分之一二非农民，农田负担比例尤须增加，此所以在 5300 多万亩可耕地中，只有 3000 多万亩在耕种。然而每一个壮丁已经要耕种 17 亩，加算一半女壮丁之力，再减去十分之一二非农民之数，每人约合十三四亩。”<sup>[1]6</sup> 耕种力负担如此之大，显然是人口太少，人力不足。

此外，贵州人口质量也需提高。人口质量亦称人口素质，指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和制度下，人们所具有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劳动技能以及身体素质水平，反映了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抗战前贵州人口质量情形见表 1。

表 1 抗战前贵州人口质量概况

人口质量诸多问题	具体体现
文盲太多	在文化水准较高的省份，文盲仅占 20%。按贵州民国二十九年统计表，贵州识字者为 92%
文化水准低	在江海沿省，一县通常会有一二个大学生，中学更是普遍。然黔省各县不但很少大学生，许多县份连个高中毕业生都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太缺乏
嗜好太普遍	(贵州遍地种鸦片，各族居民对鸦片的嗜好)，为人所共见的事实，影响本省人民的体力很大，也影响人的发展
卫生设备不足	由于交通、人才、经费等原因，医药卫生设备过于简陋，甚至若干地方医药两无，传染疾病预防无法谈到，即普通病痛的治疗也少收效，结果是可以不生的病生了，可以治好的病治不好，对人力发展影响极大
体会太弱	由于先天或后天原因，黔省人们一般讲来体质弱者较多。敌人(即日本)的童工每天都可以工作 10 小时，在本省不问年龄，很少能继续工作 10 小时

从表 1 可见，抗战前的贵州，不仅面临着人口数量少的问题，而且文化水准亦不高。查当时贵州教育，全省每千人中受初等教育的仅有 5 人<sup>[2]</sup>，接受中学教育不到 1%<sup>[3]43</sup>，“全省识字者不到 10%，大学生仅为 4%，……各县不但很少有大学生，许多县份连个高中毕业生都很少”。边远民族地区不识字率达到 95%以上<sup>(1)</sup>。这样的教育实况，许多民族居民“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一些边远地区，由于长期被教会影响，学生往往“只知上帝”，而不知“中华民国”。这种状态无疑是与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更不要说支持抗战了。面对贵州抗战时的人力现状，吴鼎昌还言，“本人认为在开发物力之前，应先设法开发人力，否则空言物力开发，等于徒劳。但是在抗战建国期间，物质的开发，也不容稍纵，所以又决定人力与物力的开发，同时并进，使其平均发展，发生相辅的作用，这是本省政府的施政方针”。针对人力开发，省府方针“也应该分别在(人口的数量及人力的质量)这两方面着眼，而以繁殖人口与增进体力来解决数量的稳定，以提高文化水准与增进能力来补救质量的不足”<sup>[1]7</sup>。

## 2. 物力开发不足，难以承担大后方重任

贵州素有“山国”之称，与内地相较，农业、工矿业、交通业等都发展滞后，就农业言，清后期以降，由于社会变乱，军阀割据等，贵州农业经济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 年，黔省可耕荒地总面积 736.8 万亩；1929 年时增至 1 330.5 万亩。1933 年更增至 1 700 万亩。与此同时，全省总耕地面积 1913 年为 2 140.7 万亩，1934 年则减少 2 120.6 万亩。在此期间，农业生产工具、劳动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也停在清末水平上<sup>[4]</sup>。此外，各军阀为增加军费，纷纷胁迫农民种植鸦片，一时贵州遍地皆种鸦片。1921 年《中华英文年鉴》载，“在镇远、施秉、思州、黄平、清平、平越(福泉)、贵定、龙里、贵阳、清镇、安平(平坝)、安顺、黔西及清溪(岑巩)等县，已经看到鸦片正在成长。”(1)(民国)《镇宁县志》卷六载，县境“每年输出(鸦片)达百万两，为本县唯一大宗”。(民国)《桐梓县志》卷二十一载，全县“土地遍种(鸦片)，无隙地”。(民国)《续遵义府志》卷十二载，遵义农民“拼命尽力种(鸦片)”等。据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黔省种烟(鸦

片)之区,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各县种植面积,总计达八百万亩以上,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六,年产鸦片十余万担。”[5]鸦片成了黔省经济主要来源。(民国)张肖梅在《贵州经济》一书言,贵州“一旦特货税协款因禁烟战功而停止,则黔省政府将立陷于无法支撑局面。”(2)吴鼎昌亦说,“若鸦片禁种,特税无着,可立减少总收支三分之一弱,省预算即无法成立”等。此类经济形态如任其发展,不但影响人的体制(3),而且粮食安全也没有保障,还会恶化抗战后方环境。

就工矿业言,贵州矿业资源“冠西南各省”。如铁矿,“几遍地皆是,全省81县中,64县皆有铁矿苗发现,矿区达333处之多”。煤矿储量达1549兆吨,有“三分之二为优质无烟煤”等(4)。然因“交通还不发达,不能大量开采”。1935年,全省稍具规模的现代工厂仅2家,资本50万元<sup>[6]</sup>。这一物力开发态势显然难以承担大后方的重任。吴鼎昌曾这样评价,“贵州人口1000千余万,土地17万平方里,在此密度甚小的人口中,办理兵役,诚然困难。但贵州除了兵役。便没有更好的途径,报效国家,盖贵州历年来靠中央补助,在此全面抗战中,别无财力做若何报效,惟有贡献壮丁。但就数日言,每月仅配赋壮丁6000名,较之其他各省,相差尚远,假使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贵州即等于没有参加这次神圣的战争”<sup>[1]63</sup>。张肖梅亦言,贵州“僻处西南,山峦重峻,地势崎岖,天产物品,极其繁富。然以交通不便,遂致各种事业,皆形容落后。又因栽种鸦片利益优厚,在未禁种以前,多注重于此,致其他事业多未顾及。至‘七七事变’后,渐为国人所重视。黔省人民,亦鉴于国劳日危,群怀覆亡之忧,而救国图强之念愈强,虽感物力、人力之不足,然对各项事业,莫不力谋次第振兴”(5)等。

### 3. 交通有限,难以充任西南交通枢纽

交通是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前提,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为交通问题所困扰。吴鼎昌入黔前,贵州交通线主要是川滇黔道、湖广经黔入滇道、川黔桂等,其铁路、公路、水陆、无线电报等都不甚发达,如全省“电话管理机关、计有电话局、电报局及公路局等处,然各自为政,缺乏统一,于电话及联络很多不便”。运输工具主要是人力、畜力。吴鼎昌言,黔省“现只有汽车、牲畜及人力,汽车成本太大。抗战期中因燃料问题更觉不经济,牲畜及人力则载重太小,也不经济,现正设法兴办马车,已完成了几部,在试用中,载重约580斤”。张肖梅亦言,“贵州对外交通,可谓极端隔绝,即在本省之内,也因崇山密布,即属邻境,亦有咫尺天涯之感……陆行除借用畜力外,即唯人力是视,以致行旅既困,货运更非易事”,“其封锁状态,迄未稍减,是观当时之公路,邮电里程以及车辆设备之数量,可想见其一斑”(6)等。

除以上诸问题外,抗战前贵州形势还有政府行政效能低下、黑社会盛行等。民国时期,地方行政最基层组织保甲,行政者由于训练不足,执行能力甚差。“县政人员对于新颁法令,多未谙习,以个人见解任意施政”等<sup>[1]67</sup>。加之抗战前,贵州经历长期战乱,黑社会组织盛行。吴鼎昌言,“民国光复时,贵州帮会猖獗,为害甚大,犹为黔人所未能忘怀者”。如精忠社、同善社、青帮、洪帮等,精忠社乃贵州最著名帮会团体,虽在光复贵州时,曾一度解散。然1942年,该社又在贵阳开山辟堂,导致其他非法组织纷纷暗中成立。同善社创立于清朝末年,该社在贵州的势力“首推三穗、镇远、松桃。次为岑巩、黄平、江口、玉屏、施秉、台江各县”(1)。抗战中,该社在国统区秘密暴动,激起民变,“黔东事变”就是一例。此外,该社党徒还在京沪间与汪伪政权勾结,口号是“抗兵、抗粮、推翻国民政府”,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关注。1942年,陈诚就给吴鼎昌的电报言,“据报汉奸周佛海派同善社分子,经沅陵潜入湘西,阴谋组织暴动,破坏后方”等(2)。

贵州以上诸形势,如处理不当,就难以做到屏藩陪都,支持前方抗战之目的,故急需要一位既懂经济,又能科学处理黔省社会诸问题的人出任主席。吴鼎昌凭其任职过北京民国政府国会议员、南北和谈,“北四行”首脑,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经历,当然在政府考虑之列。“故蒋介石考虑再三,……由行政院任命吴鼎昌出任贵州省主席”<sup>[7]</sup>。国民政府的这一任免,也凸显出了吴鼎昌的学识、资历、地位、声望、能力、以及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当时贵州也有人说:“贵州这地方……百纲待振,正需要培本治标的计划和实干的毅力,以他来主持省政,是颇适合的。”陈筑山说:“吴(鼎昌)对于事业有热情,黔省必有希望。”(3)

## 二、吴鼎昌治黔举措

贵州是抗战大后方，吴鼎昌入黔后提出了开发黔省、支援大西南的口号。进而提出在抗战特殊时期，贵州人力发展应与物力同时并进，平衡发展，发生相辅作用。

### 1. 人力开发举措

人力系人们的劳动能力，是最基本社会要素，无论从其个体还是群体角度看，必须以成熟和有序的状态投入使用才能产生成效。然现实中，人力的初始状态确处于不成熟和无序的状态，故需要加以组织和转换才能变成有效人力。抗战前贵州人力，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少质量低。吴鼎昌言，人力保证首先是繁殖人口与增进体力，其次是提高文化水准与增进能力，就繁殖人口与增进体力言，政府举办的工作主要是卫生、禁烟、军训与体育，及习俗之改善；就提高人口质量，政府重点做的是教育，以适应抗战救国对人的急切需要，具体见表 2。

表 2 吴鼎昌人力开发举措

人类开发类型	人力开发工作	具体内容
繁殖人口与增强体力	卫生	建卫生机构，充实卫生设备，划拨卫生经费，完善卫生行政系统等
	禁烟	禁种、禁吸，进行烟民登记，传戒或劝导自戒等
	军训与体育	学校方面，省府颁布了“贵州省中小学战时教育课程实施办法”，在办法中规定男生要厉行军训。女生实施军事体操或看护训练。社会方面，成立省军管区，对省内约 170 余万人，开始军训
	改善习俗	培养民众奋发蓬勃、刻苦耐劳的习惯
提高文化水平与增强能力	民众教育	教育内容是启发一般民众之国家观念，增强民众之抗战意志。做法是规定各中等学校应附设民众学校 1 所，联保办公处各附设民众学校 1 所，全省总共 5 500 处。普及民众教育，除增设民众学校外，更辅以广播教育
	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对象是孩童教育。在民国二十七年，短期小学全省有 900 所（省款办者 857 所，县款办者 43 所）
	中等教育	主要是培养合格老师，设有 30 位视导员，时常视察各校，督导改进
	高等教育	大学及专门人才的培养，设公费生、代费生等
其他	方言讲习所	主要针对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做法是在民族地区推行通普通话，要求施教者学习方言，然后到民族地区施政布教
	职业教育	要求培养人才机关与利用人才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需要什么人才，就训练什么人才，要求农业改进所也参加等

从表 2 见，要保证人口数量，就得推行医疗和禁政。故吴鼎昌言，“一定要人们讲清洁，然后一切病疫可以防止，人口的死亡可以减少，那么建设力量也才充实”。又言，“各种地方行政应以卫生为第一，民族体力不足，国家既无由强盛”等。因此对鸦片烟祸，吴鼎昌痛心疾首地说，“有贵州即无鸦片烟，有鸦片烟即无贵州”，“烟毒是贵州最大的病根，它造成人民孱弱，文化生产两俱落后的现象”。对此，他带领的省府采取了“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按期清缴鸦片烟土”，“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带头示范”，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等措施。颁布了《贵州省 1939 年肃清偷种鸦片办法》《消灭本省本年各县民间偷种罂粟方法》《彻底查禁种烟》《彻底禁止偷种烟苗办法》等法令法规。通过以上诸措施，一定程度刺激了人口增长，历史上贵州的鸦片烟祸也得以有效制止。

在提高人口文化水准方面，吴鼎昌认为，“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机关，在若干年中必须常设。因中国现在人才太少，中下级人员需要更多，尤感缺乏，必须就已有人员，常加训练也。”“民众教育必须厉行若干年，不可间断。因在建国期中，灌输一般成年人之建国常识，实为当务之急”等。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推行教育问题，通过了《贵州省中小学校附设民众学校办法》《贵州省短期小学协助办理联保民众学校办法》等议案。值得一提的是，1937 年前，贵州还没有一所现代正规大学。抗战

---

开始后，随着内地高校先后迁来贵州。吴鼎昌认为应注重培养大学人才，为本省优秀青年提供上大学的机会。在国民政府批准下，相继建立了贵阳医学院、贵州农工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建立，标志着贵州正规教育已有了完整体系。

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省份，人口约占省总人口数的 30%以上，吴鼎昌称其为“土著同胞”<sup>[11]</sup>。为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吴鼎昌制订了《贵州省边民教育推行方案草案》，要求各县政府设立边民教育促进委员会，成立贵州省民俗研究会；硬性规定教育经费占各县预算的 40%，其中民族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经费的 30%；为更好地开展少数民族教育，还开办了“方言讲习所”，传授少数民族普通语言，让少数民族同胞有享受同样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吴鼎昌还置办了建立图书馆，科学实验馆，民众教育馆，巡回施教车等一些教育设施，以推进教育。

总之，吴鼎昌在贵州开发人力的举措是适应抗战需要的，通过增加人口实际数量，健全体能，提高国民素质，积极支持了抗战伟业，对贵州发展影响深远。吴鼎昌曾言：“假使能使卫生行政普及，贵州人口数量增加八倍（500 万），质量强健一倍，教育行政普及，未来之 1500 万人民无文盲，82 县平均有大学生毕业三五人，贵州大学有世界的全国的学者主持讲座，以天时地利相当适宜之贵州，何患物力之不克发展，财力之不克配合。”

## 2. 物力开发举措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西南作为抗日的大后方和反攻基地，为配合政治、军事上重大举措，国民政府把中国经济导入了战时轨道。故贵州物力开发受到国民政府和贵州省府的高度重视，关于物力开发，吴鼎昌从农林牧蚕、电工矿诸方面进行了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吴鼎昌的物力开发各举措，是一个相互帮撑的整合体，就金融言，“农业金融机关，不以合作社为贷款对象，惟借款用途限于垦荒、畜牧、工业……等项”。而生产资料贷款委员会及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主要“限于农田水利及工程用款”。电为工业主要的原动力，“欲工业发达，非有大量的电力不可。工业则为农产品加工，是开发农业必要的步骤，否则仅谈开发，难有销场”等。由于物力开发举措明晰，大大促进了抗战时黔省的经济的发展。

## 3. 交通运输

1937 年 11 月，吴鼎昌飞抵重庆与记者谈话时讲到，贵州要“以发展交通，促进经济文化为主”诸内容，表明他对黔省交通运输已有深入思考。他在《花溪闲笔》中将交通分为“铁路、公路、水道、交通工具、电话、无线电台、有线电报及广播事业等八项分别报告”。书载，“西南铁路建设计划，原拟以贵阳为中心，分筑铁路通川、滇、湘、桂四省。抗战发生后，建筑经费及材料来源都发生问题，原计划不能进行，所以与交通部商洽，改筑筑威及筑柳两条”。“公路拟再修干路十条”，“以助公路之不足”，“计划把流经黔省各水系而与抗战军运有关河流，设法疏浚清水江、乌江、榕江、红水河”等。从上可见，吴鼎昌开发贵州交通是一集道路建设与通信建设于一体的思维模式，这一做法，对于加强贵州与外界的联系，弥补交通不足有着积极意义。

## 4. 其他方面

要开发人力，物力诸事宜，就得有稳定社会治安和金融的支持，还得靠有贤能的行政者执行。胡文忠言，“地方得一廉能之吏，贤于十万甲兵”，这就必然牵涉地方行政者能力和完整的金融系统建设。贵州地方行政的关键是行政者能力低下，为求速效以应抗战之需，保障省府政策的畅达，吴鼎昌提出加强训练保甲人员，充实保甲人才的举措。具体做法是通过举办保甲干部训练班的形式训练保甲人员，受训人员主要是各县政府主管保甲的第一科科长，招考有志地方行政的青年。训练毕业后除调训的第一科科长仍回本县服务外，其余的分派他县，办理保甲训练。县保甲人员的训练采取分批次进行，第一批是训练联保主

任及联保书记；第二批是训练保长，第三批是训练甲长。除保甲人员外，一般的地方行政人员，如各县秘书、科长、科员、督学、技士、区长、区员等也需要加以训练，要求来省县行政人员训练所学习。同时为求速效，政府还提高用人标准，除有特殊资历或经验的外，拟一律用大学毕业生来担任县政工作等。这一训练举措提高了各行政人员的办事能力，在维持贵州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sup>[1]13</sup>。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维持地方治安等事宜，吴鼎昌还主持编订完成了《贵州省单行法规》（凡三辑），法规内容涉及官制、官规、民政、保甲、警务、粮食仓储、禁烟、卫生、教育诸多内容，对于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打击各种帮会和非法人团体提供了法理依据。在应对“黔东事变”中，还提出严密保甲、精练警团、检举奸伪潜伏等五条对策，取缔了同善社、精忠社、青帮、洪帮等组织，抓捕贵阳青帮、洪帮头子陈葆元、邓占奎等 22 人，保证了大后方的平安。为提高抗战贵州开发的效力，吴鼎昌还确立了以合作社为基础的贵州省农业金融方针，设立了农业金融机关的合作金库，为便于合作社贷款，每县设立一个合作金库等。此外，还成立了不受政府人事变动影响的商业机关——贵州企业股份公司，规定该公司官商合办，资本定位 600 万元，分为 6000 股，每股 1000 元，凡政府举办的企业，都交给企业公司去办理，但并不是垄断，民间愿意办理的企业，由民间自办，企业公司并不抢，反而做必要的资助。这一企业的成立对盘活抗战时期贵州经济、活跃金融，开发贵州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三、吴鼎昌治黔的影响

吴鼎昌主政贵州期间，由于采取了务实开发政策，不仅在抗战中促进了贵州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贵州以后发展亦影响深远，体现如下：

#### 1. 社会稳定发展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稳定，是省府乃至国民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吴鼎昌主黔期间，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诸如鸦片、疾病、黑社会等，进行了打击和防止。他上任伊始，即按照前任的既定计划，制颁了《贵州全省厉行禁绝鸦片实施办法纲要》等，作为“今后办理禁政之准则”。《纲要》要求把剩下的本该缓禁的黔西 22 县之鸦片，于 1938 年 10 月底以前禁绝。这样，从此以后贵州省没有哪一个县可以再种植罂粟了。鸦片的禁种，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1942 年，吴鼎昌巡视黔东十二县，就其所见言，“十二县中普遍的风气改进，最显著者一为戒烟，一为兴学。余经过城乡不少，从未发现吸烟烟气味，严刑惩治烟贩不少，亦从未闻有人叹息可怜者，检阅乡镇自卫队壮丁约四万人，也未发见有烟容者，认洋烟为毒物，已普遍深入，风气因之转移，余敢断定新染烟癖者，现已绝无其人”（1）。又言“各县治安，大体良好，绝少股匪窜扰盘踞事实”等等（2）。

医疗卫生也是社会稳定条件之一，吴鼎昌主政黔省其间，在全省 82 县中逐渐成立了卫生院。县卫生院在 1938 年近乎为零，至 1940 年就增至 75 个。卫生经费从 1938 年的 40 万元，增至 1940 年的 100 多万元。其间还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健康教育委员会等卫生行政和教育机构，颁布了专门的卫生法令，在霍乱、疟疾等传染病防治上取得了“相当成绩”。在打击黑社会方面，成功瓦解了同善社等组织对抗战大后方的破坏等等。对于社会稳定，吴鼎昌亦言：“贵州自抗战军兴以来，要路交通相当开辟，劳力生活比较容易，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此四五年间治安情形较前改善。”

#### 2. 物力诸事宜发展迅速

抗战期间，贵州通过物力开发，经济迅速发展。据研究，1941 年，贵州省旱地面积约为 14 034 574 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62.46%。1942 年单垦荒面积就达 160 万亩。1942 年，吴鼎昌在黔东巡视中言，贵州“各县征购军粮，除天柱、炉山两县外，均已八成以上”（3）。“1941—1945 年间，贵州省总计共配征军粮稻谷 7400689 市石。加上津贴县级公务员的公粮等，5 年间，全省以各种名目所征的粮食，总计稻谷 1241209 市石”<sup>[4]192</sup>。贵州冶铁业，抗战初期采冶点增到 130 余处，全省生铁产量 1937

年为 5 266 吨，1940 年增至 14 501 吨，1944 年达 67 500 吨，比抗战初增加了 10 余倍<sup>[8]</sup>。贵州省的工厂数量和资本额七年中分别增长了 10 多倍和 50 多倍。现代工厂数从 1935 年的 2 家增至 1943 年的 97 家，资本总额则从 50 万元增至 4 792 万元。全省修筑公路 2 300 多公里，加上原有公路共达 4 082 公里。黔桂铁路于 1944 年铺轨通车至都匀。全省还先后修建或扩建了清镇、黄平、独山、安顺等七处机场。金融业、商业也有较快发展<sup>[6]</sup>。

物力开发成绩最为显著者，当数贵州企业股份公司。贵州企业股份公司是吴鼎昌主政贵州期间的一大创举，它的成立，不仅推动了抗战时期贵州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全国营造了一道“战时经济光彩夺目的景观”。据统计，1943 年 6 月，该公司经营的工矿企业从成立时的 11 个增至 29 个，盈利从 1940 年的 697 393 元增至 1945 年年初的 6 983 000 元，职工人数从 1941 年 6 月的 1 751 人增至 1944 年的 4 480 人，产品多达 2 000 余种，其中的汽车木炭代油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交通缺少汽油的困难。同时，它还为贵州工矿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管理和技术人才。贵州企业股份公司由于对地方经济和抗战贡献较大，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贵州日报》《西南实业杂志》等媒体，竞相刊发报道、文章和评论，中央和地方官员、社会贤达、爱国华侨闻讯后纷纷前往贵州参观考察，闽、陕、皖、桂、粤、川、康、滇、甘、鄂、绥等兄弟省份则群相仿效地成立了类似的公司<sup>[9]</sup>。卜箐芳在《忆吴鼎昌治黔》一文中说，“贵州企业公司大的方面是成功的，方向是正确的，各省多思效仿。甘肃主席谷正伦，回安顺探亲，路过遵义，向专员高文伯和我谈了许多贵州的行政措施，特别是办贵州企业公司的经验，拟在甘肃推行”<sup>[10]</sup>等。

### 3. 教育蓬勃发展

抗战前贵州教育发展落后，面对此一局面，吴鼎昌积极推进形式多元的教育，先后成立了贵阳医学院、贵州农工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国立大学。同时，贵州的初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和民族教育也有较快发展。据统计，民国三十一年，黔省乡镇中心小学达到 999 所，保国民学校达 3 402 所，学生达到 524 258 人。民国三十三年，全省中心小学学校增至 1 580 所，保国民学校增至 8 410 所，学生达到 719 185 人<sup>[3142]</sup>。中学数量则从 1937 年的 31 所增至 1945 年的 121 所，学生人数增长 28 倍。同时中等师范学校亦得以迅速发展，据民国三十年统计，全省师范学校由民国二十七年的 8 所，增加到了 23 所，由 47 个班增加到了 73 个班。学生由 1 685 名增加到 2 699 名（1）。关于兴学之风，1942 年，吴鼎昌在《黔东巡视纪要》中言，全省“兴学之风，其热烈程度更出人意外”，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学“全用国语，毫无障碍”。“至于初中学校，几乎每县均热心建立”（2）。又言，“各县民众对于募捐修建国民学校校舍均具热情；多数县份设校数目已达到规定标准；各县均已拟具国民教育实施计划”（3）等。

从上可见，虽然民国时期贵州教育发展有限，但与以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贵州近现代完全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体系。此外，教育还包括对行政干部的培训，据《花溪闲笔》载，当时贵州全省“八十一个县长中大学及专科以上毕业的有五十八人（内中三十五人是大学毕业），非大学毕业的二十三人，佐治人员中秘书及第一、二两科科长以十分之八是大学及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等。

吴鼎昌主政贵州的七年，黔省社会较为稳定，经济发展，教育大步向前，发挥了大后方的作用，支持了前线抗战。对此蒋介石等国民政府要人对他评价甚高。民国三十二年春，蒋介石来黔视察，在省临时参议会上言，“贵州人近来已在天堂矣！若在民国二十四年，则尚在地狱之中”<sup>[11]</sup>。有一次，冯玉祥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来黔视察，入黔后，一下车访问很多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学生、家庭妇女，谈话的内容除生产生活外，还要问到一般的政治常识和抗战问题，结果所有他问到的人都对答如流。他大吃一惊，想不到贵州的落后乡镇会有这样的进步。从（黔北）松坎到（黔中）贵阳，他都很满意，最后认为“吴鼎昌治理贵州不错”（4）等。

## 四、余论

吴鼎昌主黔期间，值全面抗战之际，为发挥贵州抗战大后方作用，他在黔实施了人力、物力开发齐头并进措施，将官僚资

---

本引入贵州，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建立了各种地方资本企业，投资金额达数亿元，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发达的后方基地。在发展教育方面，除了建立民众教育、义务教育，民族教育诸类型外，还创办了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等，使得贵州有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对当时乃至今天贵州人才培养，人的素质提高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吴鼎昌在启用青年人才、严禁烟毒、打击黑恶势力，建立安定社会诸方面也都成绩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1月，杨森接替吴鼎昌出任贵州省府主席等要职，着意贯彻蒋介石“军事第一”“政治配合军事”之原则，来解决当时贵州存在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吴鼎昌主政贵州所取得来之不易的成果既没有得到巩固，也没有得到扩大，反而趋废，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 参考文献：

- [1] 吴鼎昌. 花溪闲笔[C]//民国贵州文献大系:上册:第五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
- [2] 孔令中. 贵州教育史[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283.
- [3] 何长风. 吴鼎昌与贵州社会[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 [4] 贵州通史编撰委员会. 贵州通史:4卷[M]. 当代出版社, 2002.
- [5] 蒋德学. 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1卷[M].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243.
- [6] 刘学洙. 《花溪闲笔》与吴鼎昌的主黔策略[J]. 文史天地, 2002(7):24-29.
- [7] 徐予. 中国十大银行家[J],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256.
- [8] 贵州六百年经济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333.
- [9] 何长风. 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司的思想与实践[J]. 贵州社会科学, 2000(4):110-112.
- [10] 卜箐芳. 忆吴鼎昌治黔[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98.
- [11] 尚传道. 对吴鼎昌主黔七年的回忆[C]//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31-32.

#### 注释：

1 参见何长风：《吴鼎昌与贵州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莫子刚：《吴鼎昌与抗战时期贵州禁政》《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林绪武：《吴鼎昌的实业主张与实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蔡志新：《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的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等。

2 参见贵州省教育厅：《贵州教育绪言》，民国三十二年，贵州教育厅印制，第1页。

3 参见《英文中华年鉴》，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 
- 4 参见（民国）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 1939 年，第 Q8 页。
  - 5 竺可桢初到贵州时发现，轿夫们“每行 10 里或 15 里就得停下来休息，过足烟瘾之后，才有力上路”。
  - 6 同（2），第 A21、A25 页。
  - 7 同（2），第 A26 页。
  - 8 同（2），第 A2 页。
  - 9 参见刘时范：《黔东事变纪要》。
  - 10 参见程奎郎：《黔东事变经过》，《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 187 页。
  - 11 参见《西南导报》（第一卷第三期），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版。
  - 12 参见吴鼎昌：《黔东巡视辑纪要一》，《大公报》，1942 年 4 月 29 日。
  - 13 参见吴鼎昌：《黔东巡视辑纪要三》，《大公报》，1942 年 5 月 1 日。
  - 14 参见吴鼎昌：《黔东巡视辑纪要四》，《大公报》，1942 年 5 月 2 日。
  - 15 参见《贵州教育师范教育》，民国三十二年，贵州教育厅编印，第 84 页。
  - 16 参见吴鼎昌：《黔东巡视辑纪要一》，《大公报》，1942 年 4 月 29 日。
  - 17 参见吴鼎昌：《黔东巡视辑纪要三》，《大公报》，1942 年 5 月 1 日。
  - 18 参见王尧礼：《花溪闲笔·整理前言》，《民国贵州文献大系》（上册第五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III 页。